

简论数字化语境下的教育传播观

□杨 旻 杨玉茗 高 玮

(国家开放大学 实验学院,北京 100039)

摘要: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而教育的终极目的也就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面对当下互联网和新媒体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境,我们应在知识和文化之外,关注到媒介这一教育手段和传播手段的重要意义,在教育和教学中构建起数字化语境下的教育传播观。

关键词:数字化;课堂;教育传播观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350(2019)03—0014—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秉持对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我们应进一步加深对文化、教育的认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导性理念,进一步深化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作用。面对当下教育领域汹涌而起的数字化浪潮,建立起数字化语境下的教育传播观成为远程教育领域一个重要而崭新的课题。

伴随着扑面而来的互联网浪潮,各种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新型学习方式方兴未艾,融合了多种媒介手段的网络课、微课堂正悄悄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学习方式,更有人大胆地预言:打破传统课堂的“数字时代”已然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门类众多

的各种课程纷纷上线,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创新与探索。在出版于1969年的《教学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活动》一书中,波兹曼就已经把课程教学看作一种信息的传播,而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念更是早已深入人心,因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将“数字化课程”视作一种对于人的教育的“延伸”,置于传播学的视域下进行审视和辨析,或许更有助于我们认清它的价值与界限。

一、知识与媒介——构建数字化语境下的教育传播观

在诸多对于教育的讨论研究中,教育与文化的联系深受关注,从教育的理念上看,教学不应是呆板地对知识进行一种逻辑上的陈述,更为重要的是同时关注知识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在教育与文化的联系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被忽略,这一因素就是“媒介”。事实上,在当下的数字化语境中,如果我们以传播的观念来透视教育的话,那么在传递文化的过程中,“媒介”便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我们提到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的时候,往往容易误以为媒介本身便是建构和成为讯息的内容与意义,但事实上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麦克卢汉所强调的是新的媒介所带来的“一套隐蔽的服务环境”,他在《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一书中特别对此做出了解释:“我说‘媒介即讯息’时,我的

收稿日期:2019—08—06

基金项目:国家开放大学规划重点课题“远程学习者移动学习模式的适用性研究”(G14A0011Y)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 旻(1979—),男,吉林四平人,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讲师,博士;

杨玉茗(1995—),女,河北衡水人,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研究实习员,硕士;

高 玮(1992—),女,山东烟台人,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研究实习员,硕士。

意思是:汽车不是讯息,这里的讯息是汽车产生的结果,比如公路、工厂和石油公司,那才是讯息。‘媒介即讯息’说的其实是一套隐蔽的服务环境,由革新造就的隐蔽的服务环境;使人改变的正是这样的环境,而不是技术。”^[1]正因如此,每一次技术上的变革都犹如“点金术”一般,当新的技术手段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实现了对于人的感官和能力的“延伸”的时候,社会中的一切组织和结构都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在这里,新技术成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动力,所以当麦克卢汉谈及电力媒介的时候,他才会说:“今天我们在电力媒介之中看到了它们的力量,我们在几千年前发明的拼音字母中也看到了这种力量。”^[2]而当我们把教育视为一种传播的时候,那么新媒介和新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引发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变革便成为一种必然。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说道:“学校是印刷机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3]印刷工业及其所造就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成就了现代的学校制度,知识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下进行分类并得到传播。正如波斯曼所阐述的那样,“在1480年信息爆炸之前,英格兰只有34所学校;到1660年学校总数达到了444所,每12平方英里就有一所。普通学校迅速发展的最明显的原因是信息失控引起了焦虑和混乱,学校的迅速发展成为必要的回应。课程设置的发明就是逻辑的一步,目的是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学校成为技术统治文化的第一种世俗的管理机构,它们使一些信息流动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动声誉扫地。”^[3]印刷技术的推广构建起了学校的围墙,构建起了课堂教育的独特特权和校园围墙对于知识的垄断,同样构造起了传统的课堂教育理念和以“学校”“课堂”“教材”三者为中心的固有教育模式。

早在20世纪中叶,麦克卢汉便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出现的“没有围墙”的电子时代的课堂的新的发展变化,而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互联网教育的先行者莱文森更在当时便设想创造一种以网络为基础的“超越时空”的崭新的教育形式:“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同样的课堂,从世界任何角落都可进

入的课堂——即使在这个地球之外也能够进入的课堂——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和电话线连接就行。这样的课堂讨论非同步进行,持续不断,每天24小时,每次上课人数不限。”^[4]这一设想在今天早已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应用在网络教育教学中,各种形式的AOC课程、“三分屏”课程、视频公开课、慕课、微课等层出不穷,在技术手段的应用上也花样百出,极尽所能,“围墙”的破除,一度让我们陷入了技术的狂欢与盛宴之中。

然而,当我们身居“围墙”之外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构建数字化的课程体系的过程中警惕另一种极端的倾向,正如波斯曼在《教学作为一种保存性的活动》和《教育的终结》中所做出的反省那样,当技术的狂欢侵蚀了我们的文化,学校更应该保持一种理性与克制,他认为,学校仍是围绕前电子时代的传播模式组织起来的信息系统。学校存在了很多年,而它的偏向也是属于旧时代的。因此,它比我们想象的更有价值。

“媒介即讯息”。当学校试图完全凭借着现代网络技术的媒介完成课堂教育的时候,我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印刷媒介传统便被打破了。在诸多网络教学凭借技术手段不断花样翻新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技术的创新并为之鼓舞,却忽视了在新兴网络技术媒介和传统印刷媒介背后的教育传播观念的差异:印刷媒介所承载的教育传播观念强调历时性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循序渐进的理性精神,可以说,现代文明的精神即肇始于此;而技术媒介更倾向于共时性的多元并存,受到消费文化影响至深,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这样的教育传播观念下,课堂学习带有了功利化的倾向,知识似乎沦为了一种学生用来追求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许多主要依赖技术媒介的课堂上,学生对于学习和学业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似乎求学不应是一个艰辛和痛苦的历程,而应成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玩乐”,许多教师似乎也认为对于教学而言,对于技术媒介的应用似乎成为一件最重要的事,而知识本身和传授知识反倒退居末席,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在当下我们构建数字化课程的教育传播观念的时候,一方面应该善用技术媒介所带来的破除“围墙”之后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也应该清醒地意识

到学校和课堂教育应该秉持的基本的教育哲学理念:传递知识 培养学生形成一种独立而自由的价值观。数字化语境下教育观的建立,不只是建立一种凭借技术媒介手段的课堂模板,更应力图在技术的便利性与印刷话语理性的传承中找到一种实践性的平衡,构建一种“平衡”的教育传播观。

二、内化为文——人文精神观照下的融会“互文”

“互文性”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罗兰·巴特主持的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学的狂欢化理论的基础上,她创造性的使用了“互文性”这一词语,强调“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她指出每一单独的文本都不是与外界绝缘的封闭的话语系统,而是与其他文本相互联系,彼此参照,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对此她这样解释道:“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在一个确定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5]

福柯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中曾指出:“书的界限从来就不曾明确界定,……它总是在与其他书、文本和语句的参照系统中得以把握,它只是网络……一个参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6]同样罗兰·巴特在《S/Z》一书中也强调:“在理想的文本中,众多网络相互作用,却无一能够凌驾于其他网络之上。”^[7]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互文本构成了一种取消了中心的无边存在,任何的文本都在吸收其他文本,任何文本都在转化成其他文本,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文本都在阐释和限定其他文本的意义。

与之相类似的是,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的网络时代中,任何“文本”都处于互联网这个取消了中心的无边际的汪洋之中,他们相互阐释,相互吸收,更通过各种超链接发生着种种联系。只是在这里“文本”的形式出现了不同,克里斯蒂娃所论述的基于文字文本,在网络时代中具有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成为杂糅着文字、图像、声音的复合

符号文本。在数字化的语境之中,这样的复合符号文本打破了原有的文字文本静止稳定的结构体系,链接着语言、声音、图像等多种符号构成一个动态的整体,形成了更为广泛意义层面上的文本互文性。

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原有的印刷媒介的条块分割似的分类方式已经不能应对海量的电子信息了,原有的结构体系在数字化语境中被打破,揉烂,又综合成一个整体。而人也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延伸”,教育的模式与工作的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像麦克卢汉所指出的:“这样的延伸是进化的延伸。进化不再是千万年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延伸,而是过去几十年那种信息环境的延伸。现在,我们可以把自身机体的延伸外化为环境,外化为教学机器,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跨越千百年的时光。全球规模的人造环境,从进化的意义上说,是一步伟大的跨越,这是比我们整个生物机体的进化伟大得多的进化。”^[1]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数字化语境下的课程综合了文本、图形、绘画、视频、动画、音频等其他可以通过数码呈现、保存、传播与处理的多种媒介形式,构造了一个丰富的多媒体互文体系。

与强调专门科目知识的教育不同,文化素质教育则更关注客观的知识相互作用,融合于“人”这一主体,并在这一主体内产生“互文性”化学反应的文而化之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把客观的知识对象综合并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活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素质教育的精神内核与数字时代的多媒介互文体系形成了共鸣。而教育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也正构成了教育手段与教育效果的统一。

从传统课堂到网络数字化课堂的转变,不是对原本课堂讲授的简单的浓缩移植,更不是多种媒体手段的机械叠加,如何建构和调节其中的多种媒介的互文性关系才是关键。数字化语境的课堂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以现代网络技术为基础,文本、图形、视频和动画等多种媒介互文的生态结构,在这样的生态结构中,知识的讲授和意义的建构不应是生硬的依据学科划分直接表述的,而是通过这样的多种媒介与多学科知识相互阐释相互联系的互文性意义结构来完成的,各学科的知识在总体结构中产生新的超越于其自身的意义。只有通过这样知识的互文关

系构造的崭新课堂才能完成文化素质教育精神在数字化课堂的呈现,才能完成对传统课堂结构主义意义上的颠覆与重构。

三、媒介素养教育——教育观在数字化语境下的自省

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他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一个能够为人类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美妙体验的“新媒介”,他称之为“多感觉媒体”。然而让人们沉浸在其中获得感官享乐的同时,这个所谓的“美丽新世界”也是一个技术垄断、人成为媒介和技术的奴隶的“悲惨世界”。在今天的现实中,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的思想、情感和体验进行着“异化”。当一种强有力的媒介深入到教育领域乃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陷于其中而失去客观性和批判力。新媒介出现的时候,常常被我们简单化的看成只是一种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或只是一种更为便利的手段,然而在新媒介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和认识都会被其悄悄改变。今天的互联网媒介早已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更为便利和更易被接受的方式来进行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而是凭借它自身强大的影响力在改变我们的时代、改变我们的文化,以现实的功利主义和将所有信息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主义观念解构着我们对于深刻内容和历史的感受。因此当我们沉浸在新技术媒介为我们提供的便利化、碎片化的知识便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有一种对于知识教育的自觉和对于技术媒介的反省。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数字化媒介资源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对学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成为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媒介素养教育,不是简单的教学生如何操作和运用新媒介,当然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网络课程系统进行适当的培训也是必要的,事实上学生往往在这一方面并不存在太多的障碍,他们乐于并且擅长灵活的使用当下的网络媒介的各种功能,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学生们对于新媒介更多是视之为理所当然地接纳而缺少一种对其进行反思的自觉意识。因此,正像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提出的:“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的获得,乃是个人与国

民在学习如何应付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学会如何读解、批判和抵制社会文化方面的操纵,可以帮助人们在涉及主流的媒体和文化形式时获得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在面对媒体文化时的独立性,同时赋予人们以更多的权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环境。”^[8]而对于媒介教育而言,正是要对媒介提出质疑、进行反思和展开批评,让学生从更为深刻的角度理解网络传媒和新时代的技术是以何种方式介入并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我们的文化的。

媒介素养教育,首先应该是技术媒介的历史教育和专门学科的历史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追根溯源,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媒介技术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媒介技术是如何介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乃至生活当中的。正如我们要学习文学,首先应该学习的是文学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沿革一样,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去追溯技术媒介的历史源头,对媒介的意义和媒介的内涵有最基本的理解。而对于专门的专业学科的学习,也应该在网络教学中介绍媒介入学科教学的历史以及新的媒介如何影响了本门学科的教育与学习。只有当学生具备了这样的技术媒介历史的知识 and 学科历史的知识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对于当下的媒介运用和媒介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具有反思的意识和自我反省的自觉。

媒介素养教育还应该包含对于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考察、质疑和批评。媒介的传播是具有某种特定的“偏向”的,媒介既塑造同时又在迎合当下的受众的情感倾向、喜好和思维习惯,在教育领域中的网络传播媒介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与一般的网络传播媒介不同,教育媒介天然的具有对知识的话语权、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和强制学生接受的强制力。我们今天教育媒介带来了碎片化、扁平化的便利,但同时也暗含着功利化、消费化和娱乐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与教育的本质目的是不相符合的。我们在教育教学中引入新媒介新技术,方便了学生,提供了便利,但这不应该以牺牲教育的目的作为代价。所以在我们引入和推广一系列数字化教学模式的时候,应该同时为学生提供批判的方法和工具,而这种方法和工具,就是媒介素养教育。

在技术快速变革和传播媒介日新月异的今天,

我们在传播学的视域下对数字化教育媒介进行审视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数字化语境下教育传播观念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创造出一种融合,这是印刷媒介与网络媒介的交融合一,也是围墙内的课堂教育与数字化课堂的融合,更是知识教育与文化在人文关照下的融合。这一融合,应以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为终极目的,不是禁锢人,而是为新时代的人类提供更广阔的可能性和自由。

参考文献:

[1](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如是说: 理解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加) 埃里克·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精粹[M]. 何道宽译, 南

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美) 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美) 保罗·莱文森. 莱文森精粹[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 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 外国文学评论, 2004(3): 19.

[6](法)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7.

[7](法) 罗兰·巴特. S/Z[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8](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M]. 丁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On the View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Digital Context

Yang Yang, Yang Yuming, Gao Wei

(Experimental College,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Educating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educ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people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Fac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sweeping by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media as an educ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means besides knowledge and culture, and 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contex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digitization; classroom; view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本文责编: 赵凤媛